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中国传统哲学

王志功著



人文出版社



200017980

A841.63
42

86708

062567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中国传统哲学

王志功 著



人文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富有意义的课题。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运用详实的历史材料，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作出了富有开拓性的回答。它向人们表明，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来自西方；又是中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

王志功 著

责任编辑 刘淑英

封面设计 郑杨川

人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燕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1993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 定价：4.80元

ISBN963-10-0047-8/A·2

序 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仅有从未中断的上下五千年的民族发展史，也有代代相续、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全国各族人民在振奋民族精神、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军中，如何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怎样发挥它在振兴中华的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它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运用详实的历史材料，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作出了富有开拓性的回答。他既从多方面向人们展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它蕴含着极其光辉的富有生命力的并且曾不断激励民族前进的宝藏，值得民族自豪；又富有探索性地把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联系起来，向人们表明，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来自西方；又是中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已为毛泽东所接受，它或隐或现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本书作者清楚地告诉人们，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可贵

的探索。辛勤耕耘，必有硕果，事实正是如此。当然，这还是一家之言，它还需要作者和研究者们探索、再探索。

本人近年曾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并在兰州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课，同本书作者常相切磋，互有得益，今喜读作者新著《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颇多感受，故乐为之序。

王稼棠

1993年5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1)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的发展过程和思想资料·····(19)
第三章	从天人关系到主体和客体·····(33)
第四章	从心物关系到主观和客观·····(51)
第五章	从知行关系到实践论·····(69)
第六章	从变常关系到发展观·····(85)
第七章	从相反相成到矛盾法则·····(104)
第八章	从一多关系到矛盾精髓学说·····(123)
第九章	从民本思想到群众史观·····(142)
第十章	从性情论到阶级关系论·····(160)
第十一章	从大同理想到社会主义模式·····(178)
第十二章	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197)
第十三章	从体用观到文化选择理论·····(214)
第十四章	对古代军事哲学的批判继承·····(229)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247)
后 记	·····(249)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也都必然在思维运动的历史链环中熠熠生辉。所谓“盖棺论定”，在这里失去了它日常思维不证自明的真理性，那些不能一下子被埋进坟墓的理性硕果，多有恒久而常新的反思价值。毫无疑问，毛泽东哲学是中国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及其本质特点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两种基本的定义方向：一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哲学理论体系；二是指毛泽东本人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

对于各家学术见解，我们不作详细的引述，此处只将党的有关重要文献的论述摘引如下：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后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

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2页）

这些论述确立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原则。目前国内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和教科书，绝大多数都采取这种定义方式。

然而，毛泽东的哲学经历和哲学论著，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和命运，又是哲学探索的传统的和首要的方法。因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专注于毛泽东本人，试图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为了与已成定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相区别，有人提出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概念。这种定义方式侧重于对毛泽东个人的历史的和政治文化的研究。

对比两种定义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区别。一是在创造主体方面：在后者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立者自然是毛泽东本人，任何他人都不能代替或者冲淡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在前者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仅仅是这个集体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4页）

二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在后者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哲学活动和哲学论述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所当然的内容，不能任意地增加或删减；在前者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它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则“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

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同上）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要区别对待。

三是在发展阶段上：在后者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行程与毛泽东的生平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包括早、中、晚三个前后相继的时期；在前者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也不包括他晚年的错误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整个后期的思想，即从1957年以后，都不包括在内。

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的分野。因为在后者的视野里，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哲学活动的鼎盛时期，即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理论成果；而在前者的理解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如此一来，二者在内容上重合了。更重要的，无论按哪一种定义方式，都不能不确认一个根本的事实，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实践角度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在理论形态上，“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而要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党必须努力学习，既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又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由于毛泽东和全党的巨大努力，使得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优秀典型。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中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特征。在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座标系中，它是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它所运用和深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意味着批判地继承和革命的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座标系中，它是根据中国民族的特点，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经过毛泽东等中国哲人的缜密思考建立起来的，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民族革命斗争中的新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采用了中国民族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这种理解在承认一定的思想内容必将取一定的思维和语言形式的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但在解释这些思想内容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的关系时，则是不切题义的。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推广和运用，更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实际之客观内容的哲学概括与总结。在这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中

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实际的客观内容，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现形式。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的意义，就决不能仅仅局限在表现形式上面，而是深入到理论内容本身了。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历史地积淀下来，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实际”的文中应有之意。

二、历史潮流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撰写的碑文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页）

镌刻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文字，毋庸置疑地表明，毛泽东认为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革命斗争的直接继续，事实也正是如此。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灾难深重的近代。“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26页）为着解决中国近代社会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献身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完成了这一历史的任务。

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全面的交接和冲撞的过程，其中存在着两个互为矛盾的事实。一是西方先进

的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所处的落后的封建社会形态的矛盾。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成功地建设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朝气蓬勃，气势夺人，而中国的封建主义天朝大国，则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对此客观情势，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道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469页）如此后浪推前浪，构成了近代历史的长流。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中国近代“这段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总线索：那就是向西方学习。”（《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必须和现代历史相联系》，载《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第5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抗争，“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32页）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国家的独立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11页、第309页），是不无道理的。由此，“向西方学习”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无法回避的矛盾。

另一个矛盾的事实，是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走向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西方现代文明是乘着民主和科学两个车轮奔向世界前列的，中国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近代科学知识，却不能抛开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但在与外来文明的交接中却成了沉重的包袱。中国人固守着历史文化的本位，步履蹒跚地走向现代文明。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那时起，直到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于辛

亥革命的伟大思想家们，无不带着中国传统文化母体的明显胎记，对于接受西方文明羞羞答答。另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如张之洞、袁世凯之流，则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排拒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因此，“中体西用”模式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框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近代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巨大矛盾冲突中孕育产生的。萧延中先生十分形象地把近代思想比作是“燃烧在双重十字架上的火焰”。他指出：近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初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经济与伦理以及异质文化冲突两大交叉的十字架上”。从而形成了当时中国人的观念认同中心，“亦即社会思潮和发展的主题，这就是：在双重矛盾交叉出现的双重十字架的困惑面前，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与选择。”（《巨人的诞生》第7页）

背负着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十字架，中国哲学走上了20世纪的舞台。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发展，有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西学东渐的强化，二是儒学独尊的结束。自“五四”运动开始，更是诸家蜂起、流派纷呈。“从宏观角度观察，它大体是沿着四个方向发展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和国民党官方哲学。”（宋志明 赵德志：《现代中国哲学思潮》第7页）无论从理论影响，还是实践验证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

（张岱年：《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新阶段》，载《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第1页）因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一是民族解放，二是社会改造。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顺利解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实际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同上）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回顾过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和他们那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历史选择。

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471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从那时起，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近代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历史任务的奋斗历程，并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接受和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背离，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中断。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这固然是由于历史发展把中国哲学推向了不变革就无以为继的困难境地，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完全是中国的。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高度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它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中国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思潮斗争、特别是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具体说来：

第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创造性地探索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马列主义不是现成的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它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列宁说：“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同样可以说，这些一般原理的应用，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旧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直接任务不是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首先进行的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动力不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旧中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革命必须首先在落后的农村展开。总之，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列宁选集》第4卷，第105页）。因此，指导中国革命不能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语句，也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现成的革命经验。它要求中国党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地、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来。

实践证明，探索这样一条道路，是相当艰难困苦的。它不但需要不断摸索的经验积累，而且需要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如果不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作出深刻而周密的论证，要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纠正了这个

错误之后，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哲学世界观高度找出错误的根源，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因此，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的同时，十分重视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的斗争中，阐述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于主观主义的批判。他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0页）因此，他主张一定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486页）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应该既善于精通理论，更善于运用于实际的。

其次，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探讨了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问题，指明了实现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这些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个原理的简单运用，而是为了实现结合的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所作出的创造性发挥。如，实事求是，它是唯物论的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性的要求；也是辩证法的原则，体现了“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也是认识论的原则，体现了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要求；它还涉及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等重要理论。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

第二、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而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后来又为列宁等所发展。它的基本体系、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已经达到了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程度。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哲学方面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另搞一套，重新提出许多新原理、新概念；也不是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而是要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只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毛泽东一生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